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到 全球政治经济学

——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理论变迁

□ 沈长剑*

摘要: 在当前西方学术界,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国际关系非常流行,罗伯特·吉尔平当属佼佼者。这里试图从全球政治经济学(GPE)产生的时代背景、全球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主题,以及这种超越引起什么改变为论述的构架,来诠释吉尔平从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到全球政治经济学的国际关系理论变迁的实质。

关键词: 吉尔平 国际关系 理论变迁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243(2010)04-0018-05

为了分析世界经济全球化及其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实际影响,许多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提出,应当用全球政治经济学取代国际政治经济学。正如斯蒂芬·吉尔所述,我们宁可使用全球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而不是普遍流行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概念。^{[1](P8)} 因为随着世界经济的变化,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次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已经无法涵盖对世界经济政治的全面评述,为解读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国际政治经济学应该让位于全球政治经济学。^{[2](P323)}

不过,从全球政治经济学角度专门论述全球经济新秩序的著作并不多见。罗伯特·吉尔平继1987年出版《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后,新千年伊始,相继出版《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和《全球政治经济学》两本专著,从全球政治经济学角度对全球经济新秩序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对世界政治经济的主要方面作了全面的评述,反映了吉尔平的国际关系理论变迁。

一、吉尔平国际关系理论变迁的动因 ——GPE 产生的时代、理论背景

吉尔平起初只想把《全球政治经济学》这个里程碑式的研究作为《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一书的第二版出版。但由于全球化浪潮的到来,世界政治、经济和相关理论的巨大变化,增进了人们对 IPE 的理解,也为吉尔平进一步的理论探索,阐述 GPE 搭建好了舞台。加上吉尔平本人对 IPE 认知的加深,使读者得以看到吉尔平的这本全新的研究论著。具体是哪些变化使吉尔平决心另起炉灶,从而产生了由 IPE 到 GPE 的理论变迁的呢?

第一,冷战的结束、苏东集团瓦解、西方资本主义的胜利和苏联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威胁烟消云散。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及其主要盟国通常让潜在的经济冲突服从于维持政治和安全合作的需要。强调安全利益和联盟团结成了政治联合

* 作者:沈长剑,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国际政治专业 2008 级硕士研究生,邮编:361005

剂,促使世界经济凝聚在一起运行,有利于各国对经济问题上的重要分歧作出妥协。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的领导地位和资本主义大国之间密切的经济合作削弱了。与此同时,以市场为导向的世界比以前大得多了,因为前共产党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更加愿意参与市场体系,欠发达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就说明了这一点。^{[3] (P3)}

第二,电信、交通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或全球互联网经济的兴起,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市场经济观念的被广泛接受。交通运输新技术使交通运输成本、特别是跨越大洋的运输成本大大下降,从而才有了建立全球贸易体系的可能。计算机和电信的发展,大大增加了全球金融的流动,这些事态在促使跨国公司执行全球战略和运作中极为重要。技术变革导致时空距离的缩短大大减少了国际商贸的成本。贸易壁垒以及各国经济壁垒大大降低,国际贸易、对外投资和跨国公司在全世界的业务进一步活跃,从而有力地激励了贸易的扩展,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经济和技术上的这些变化,投身到国际市场中来。此外,越来越多的国家执行诸如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全球经济越来越以市场为导向。这些变化和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的面貌,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程度极大提高,使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

第三,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经济区域化潮流也得到迅猛发展。^[4]经济区域主义就是为了应对全球化条件下的政治、经济和技术上的变化而风起云涌的。经济区域主义是民族国家对共同的政治问题和对高度相互依存同时又充满竞争的世界经济作出的重要反应。由于世界经济更加紧密地融合起来,参加区域化集团的国家加强了合作,以便提高它们的独立自主、讨价还价的地位,并推动其他政治和经济目标的实现。每一个区域化协定无疑都体现出各国齐心合作,以促进实现本国和各国共同的经济与政治目标的意愿。

第四,理解GPE密切相关的新经济理论:新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为分析和理解经济变化和全球经济的动因提供了概念框架。新经济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规模收益不变和完全信息等基本观点提出了挑战。强调寡头垄断竞争、规模经济和技术革新的重要性,还把历史过程、制度和空间关系结合起来考虑。强调历史、地理和社会政治制度在经济事务中的重要性,补充了以

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观点和分析方法。有助于理解世界经济在全球财富和权力分配中不连续、不均衡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深刻变化等特征。新理论对研究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动因提供了真知灼见。^{[3] (P96)}

二、吉尔平国际关系理论变迁的方向 ——GPE 研究的理论主题

GPE 的研究主题集中在这六个方面:国家、公司、资本、权力、劳工、全球化。这六个范畴是密切相连的,它们相互决定本身的性质,并且以共同而不独断的方式,界定了当代GPE所占的知识领域空间。这些范畴没有任何一项是专属于GPE,由于它们本身的性质,使的GPE成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2] (P324)}

(一) 国家

吉尔平把“全球的政治经济”定义为市场和诸如国家、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之类强有力的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作用。^{[3] (P13)}此定义体现了吉尔平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学术观点。他以此来分析国际政治经济,认为民族国家仍是国内、国际经济事务中的主要角色,民族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依然居于主导地位。世界经济功能的发挥取决于市场,也取决于民族国家的政策,国家安全永远是国家主要关心的问题。强调了民族国家是国际事务的主要行为体,也承认跨国公司、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作用。

吉尔平驳斥了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过时”的观点:经济和技术的力量已使民族国家黯然失色,并且正在开创政治边界和民族国家政府不在重要的全球化世界经济。^{[3] (P16)}经济全球化和跨国经济力量的确正在一些重要方面削弱一国的经济主权,但人们把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严重夸大了,今天的世界仍旧是以国家为主导的。民族国家继续是国内和国际事务中主要的行为体。大国绝不会让全球经济产品的分配和经济力量对其国家利益的影响完全受市场的左右。经济效率和国家雄心将是21世纪世界经济的推动力。^{[3] (P8)}即使民族国家真的消亡了,某种形式的合法的新的政治权威肯定出现。

(二) 公司

跨国公司拥有重要地位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它对国际经济一体化发生了影响。尽管早期跨国公司剥削和征服当地人民,对世界造成破坏,是有罪责的,而现代跨国公司则是欠发达国家经济

发展所必须的资金和技术的重要来源,又有益于世界各国人民。跨国公司及其投资对世界经济活动的地点、国际贸易的格局和各国经济的增长率和生产率产生了影响,但不能夸大了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各国国内经济的运作仍然是全球经济的主要特征,民族国家仍在唱主角。

对跨国公司和民族国家的关系,吉尔平承认跨国公司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但不同意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强大的独立的行为体的观点。“不管怎样,在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争权的斗争中,优势仍在民族国家那边。”^{[5](P179)} 跨国公司仍扎根于本国经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本国历史、文化和经济体系的产物,它的战略与行为的许多基本差异反映了各国在制度结构、经济政策和社会关注重点上的差异。总之,在世纪之初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无国籍的全球性公司。

(三) 资本

金融是资本全球化的支柱。21世纪来临之际,对资本全球化的分析应当始于对金融的分析。^[6] 金融领域是市场国际化最发达的领域,也是资本运作达到最高灵活程度的领域。国际金融市场的兴起为全世界有效地利用稀缺的资本资源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资本匮乏的欠发达国家可以借到资金来发展经济。“金融领域的需求清楚地反映在投资结构中:自80年代中期以来,银行或保险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一直是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的最大项目。”^{[6](P27)} 成为制造业或服务大集团日常运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外,国际资本流动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稳定。金融危机成为世界经济中反复出现的特征,国际金融流动必须接受某种调节机制的管理。

金融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国际资本流动把世界各国经济结合在一起,使国际金融面貌大大改观,增强了它对国际和国内经济的影响。但国际金融是局部全球化的,国际金融体系仍旧以国家为基础,由既密切联系又彼此独立的各国金融体系组成。金融仍以具有强烈的偏心本国效应为特征。

(四) 权力

对于国家自身生存而言,权力的意义重大:

第一,权力是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现实主义认为权力和权力关系在国际事务中起重要作用,权力以国际关系中军事、经济和心理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等其他因素也在国际

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处于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其生存条件就是为获取权力,国家必须不断地关注权力关系的变动以及在国际均势中国家利益变化的后果。^{[3](P14)}

第二,国家关注相对权力。国家间权力的分配构成了各种国际体系的主要控制形式。每种国际体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或帝国都在该体系内、尤其是在其各自的势力范围内,组织并维持一种政治、经济以及其他领域的网络。^{[7](P36)} 相对权力最大的国家将拥有对国际体系的控制权和支配权。相对权力的大小关系着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也关系着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利益等的安危。

第三,国家也注重经济权力。吉尔平用 GPE 来分析权力,增添了权力构成的新要素,权力不再是政治、军事领域的专有名称,经济领域也存在权力。市场本身是影响政治效果的权力根源之一。由经济依存关系建立起来的权力关系,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8](P15)} 经济权力的本质是中断贸易往来的能力、影响其他国家的一种有力手段。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经济权力作用得到强化。国家将利用权力来影响经济活动,争取最大限度地增加本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五) 劳工

劳工全球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达的多。这些移民潮成为决定世界经济结构的强大因素。^{[3](P331)} 在21世纪初,劳工移民不再是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即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比较高的欧盟内部,从一个成员国移民到另一个成员国的情况也比较少。移民人数大幅度下降是19世纪末全球化和21世纪全球化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别。

几乎所有国家对劳动力和对外直接投资跨国流动的态度都存在很大差别。对于资本是鼓励流入、限制流出;对于劳动力却是鼓励流出、限制流入。著名的华盛顿共识强调了贸易自由和外国直接投资自由流动等,却没有涉及劳动力流动的任何内容。^{[9](P313)} 劳工移民的壁垒正是现代福利国家旨在保护本国公民的实际工资和社会福利的政策所设置。在关于全球化的争论中,人们几乎不关注劳工和劳工移民,国家的边界肯定仍然是全球经济的重要特征。

(六) 全球化

全球化是指各国经济通过贸易、金融流动和跨

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相互之间越来越密切的联系。^{[5] (P296)} 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成了国际经济事务、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了政治事务的最突出的特征。^{[3] (P1)} 问题是各国决策者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一种认为全球化是一种非常积极的不可逆转的势头,它将会增进世界和平与繁荣。另一种则指责全球化对世界构成严重的威胁,应该扭转全球化进程,至少要把它置于某种形式的国际监督之下。

19世纪中期,英国运用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支持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实现了“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二战后,西欧和日本通过降低贸易壁垒和方便国际投资与技术的流动,加入到世界上最主要的经济大国美国所促进的全球化的行列中来,实现了“美利坚治下的和平”。这两个全球化时期都立足于强大的政治基础,说明全球化的成功需要有利的国际政治环境,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不是自动发展的,它要求各经济大国之间进行合作。国际政治的稳定是全球经济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全球经济新秩序也必须立足于强有力的政治基础。

三、这种超越引起的改变

——吉尔平国际关系理论变迁的简要评价

王缉思在评介摩根索的名著《国家间政治》时指出:评价一项社会科学理论,褒贬其中一点而不及其余,固不可取;仅举出其观点的荦荦大端做一些分析评论,也欠周全。唯有从整体上把握其结构特点,才能较为全面地判定其优劣。^{[10] (P19)} 我即以此态度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理论变迁作简要评价。

吉尔平的 GPE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发展历程方面,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借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不同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如何影响其政策选择,突破了国际层面研究的孤立性,把国际经济体系看成是国内政治变化不可忽略的因素。实现了对古典现实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的综合和超越,既从古典现实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中汲取合理成分,又注重对二者的突破和发展,形成了独特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继承和发展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吉尔平对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互动关系的看法,引发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质疑。他从现实主义视角对 IPE 的阐述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对 IPE 的诠释间的论战随即展开,争论的过程,也正是新自由制度

主义形成、丰富和完善的过程,也诱导了后来自由制度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

吉尔平围绕跨国经济变化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引发了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论战。他承认自由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体系的作用和影响,但是强调国家、国际体系的政治框架是市场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基础,自由的国际经济体系必须以国际政治框架为基础和保障。国家与国际体系是自由国际经济顺利、有序运行的前提和基础,尤其是以霸主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促进并保障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由此滋生了国际关系理论范式间的辩论。

吉尔平试图实现国际政治经济的双赢目的,以现实主义规范国际政治,以自由主义指导国际经济的运行,或者说,用现实主义作为分析框架,同时追求自由主义的价值。因此,他的 IPE 突破了以往国际关系理论范式间的封闭状态,以开放的、兼容并蓄的态度对待各种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试图实现国际关系理论各范式间的交融性。

吉尔平将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相结合进行研究,对于国家安全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事实上已经将经济安全这一非传统安全的范畴纳入到国际政治研究的视野,开辟了非传统安全的研究范畴。在对 IPE 理论来源及其动力进行阐释的基础上,对国际货币、国际贸易、跨国公司、依附与发展问题、国际金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及由此对世界政治经济转变和国际经济新秩序问题的探讨,无疑奠定了关于经济安全研究的理论基石。^[11] 通过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互动研究的结合,弥补了 IPE 研究的不足,从过度关注国际体系及其对国际和各国政治经济的影响到重视对各国政治经济体系及其对国际体系作用,使国际安全、全球安全与国家安全一起成为安全研究的主要层次。通过对非国家行为主体和非军事问题的研究使安全研究的对象多元化,使安全研究的范围得以拓展。并且,吉尔平在现实主义对权力认知的基础上,从 IPE 的角度将权力分为军事权力和经济权力两种,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现实主义的权力观。一定意义上,就国际关系实践的发展而言,经济权力推进了国际关系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任何一种思想和理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的局限性,吉尔平的 GPE 理论也概莫能外。他在 GPE 中把经济分析和政治分析相结合,以解读各种影响全球化的力量、国家政策以及经济发展与国际贸易、投资、金融之间互动作用的结果。(下转第 76 页)

高的,江南的土地是红的。塞北与江南是两种不同的情绪:一个豪放,一个婉约;一个壮观,一个秀美;一个粗犷,一个细腻;一个苍凉雄伟,一个小巧玲珑;一个铁血铮铮,一个如梦如幻。塞北是男人,江南是女人。塞北和江南,真正的对比是干与湿的对比,是风与雨的对比。塞北的黑土地博大、雄浑,兼容着野性与柔情,严峻与温馨,幽远深邃,融自然、历史和人生于一卷。那么,是什么力量使得缠绵悱恻与凌厉强悍这两种悬殊的气质能够天衣无缝地契合于一体呢?答曰:是自然。假如没有北方蒙古等高原以及青藏高原的崛起,我国东部湿润地带有可能是干旱的荒漠,而现在的西北干旱区,则有可能是温暖湿润的地区。青藏高原的严寒,北方的干旱,换来了江浙、福建、广东、广西的雨,也就是说,这些地方是全球副热带荒漠中的一片绿洲。是大自然造就了南北两地的气候特点与人文性格上的差异。

“江南文化是一种融儒、道、玄、佛为一体的文化。这种融合中,由于各种因素,特别是自然地理方面的因素、历史人文的因素、政治方面的因素,相比于北方,其道、玄、佛的影响较大,因而从总体倾向来

看,是一种阴性的文化、柔性的文化、唯美的文化。正是这种文化决定了江南的审美品格。”^[5]老子有名言:“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江南是水的故乡,河流纵横,池湖密布。出芳草鲜花,出才子佳人,也出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何必江南罗绮月,塞北也有水云乡。江南之“水”和北方“黑土”二者精神的相通之处是,它们都滋养了一方风物,都孕育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属性,都能给我们人生的感悟与生命意义的思索。

参 考 文 献

- [1] 刘士林. 江南与江南文化的界定及当代形态[J]. 江苏社会科学, 2009(5).
- [2] 跃进. 江南的开发及其文学的发轫[J]. 文学遗产, 2007(3).
- [3] 孟彭兴. 古代江南持续发展研究[J]. 史林, 2001(1).
- [4] 王洪岳. 江南诗性文化与长三角当代城市文化的建构[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6(6).
- [5] 陈望衡. 江南文化的美学品格[J]. 江海学刊, 2006(1).

(责任编辑: 陈 宁)

(上接第21页)但过分强调国家中心、霸权稳定和自由秩序,忽视了一些全球性问题的研究和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并客观上使自己成了资本主义全球经济新秩序的代言人。^[12]

参 考 文 献

- [1] 宋新宁、陈岳. 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 [2] 黄新华. 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3] [美] 罗伯特·吉尔平. 全球政治经济学: 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 杨宇光、杨炯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4] 刘慧华. 一个里程碑式的研究: 评吉尔平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 美国研究, 2004(1).
- [5] [美] 罗伯特·吉尔平. 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 21世纪的世界经济[M]. 杨宇光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 [6] [法] 弗朗索瓦·沙奈. 资本全球化[M]. 齐建华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 [7] [美] 罗伯特·吉尔平. 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M]. 宋新宁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8] [美] 罗伯特·吉尔平. 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 杨宇光等译.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9.
- [9] 张宇燕、李增刚. 国际经济政治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10] [美] 汉斯·摩根索. 国家间政治(前言)[M]. 徐昕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0.
- [11] 刘中民、桑红.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中的非传统安全研究[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4(4).
- [12] 郑先武. 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解读: 罗伯特·吉尔平“国家中心”现实主义观点述评[J]. 国际论坛, 2003(5).

(责任编辑: 陈 宁)